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澧县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

李 刚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作为一种活态的民间艺术形式,澧县皮影戏在剧本形态、剧目内容、演出习俗与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民俗价值与艺术价值。本文以澧县皮影戏在当下的生存与发展为切入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结合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澧县皮影戏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呼吁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抢救。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澧县皮影戏;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3)11-0199-03

皮影戏是集绘画、雕刻、音乐、文学、表演、舞蹈于一体的综合民间艺术,以其丰富的历史、戏曲、美术、民俗、宗教的内涵,保存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与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态样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曾指出,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在国内,由于商业文化的冲击,皮影戏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皮影戏正逐渐走向消亡的困境,面临艺人老化、市场萎缩、传承后继无人等危机。在国外,柬埔寨的高棉皮影戏(SbekThom)和印尼的哇扬(Wayang)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皮影戏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越来越凸显。因此,对皮影戏进行抢救性研究,迫在眉睫。澧县皮影戏作为湖南三大影戏之一,与长沙湘剧皮影戏、衡阳渔鼓皮影戏在唱腔、演出剧目、剧本特点等方面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其地域特色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直至民国,澧县就盛演皮影戏。直到20世纪80年代,澧县仍有大量皮影戏班在演出,极受民众欢迎。但对这种活态的民间综合性民俗艺术,学者们关注不多,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澧县皮影戏的论著出版,仅有少量论文和《澧县县志》涉及到澧县皮影戏,但大多是介绍性文字,缺乏深入的普查与研究。因此,对澧县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加以研究,有着重要的民俗价值与艺术价值。

从剧本形态来看,澧县皮影戏剧本既有唱词、对白、影人的动作、表情以及部分演出操作动作提示的完全本,也有只简单记录情节梗概,没有唱词、念白等提示的提纲本。

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获的剧本来看,其中又以提纲本居多,也叫做“桥本”,澧县皮影戏南路的代表性传承人向家班向绪庆的皮影戏抄本大部分为提纲本,如《沙陀搬兵》、《罗成投唐》、《初进宫》、《罗通扫北》、《水罗寨》、《宫门挂带》、《四明山》等本子都是以总纲的形式较为简略地记录了故事的情节梗概。从文本特征来看,这种桥本“篇幅都不长,其结撰方式和内容都无特殊規制。就其结撰方式而言,有四种情形,或是根据故事情节将其分成若干场或故事段落整理,或是将整个戏分成若干本按本整理,或是不分场不分本只叙述故事,或是虽是连着叙述却以数字序号标示其故事单元。至于桥本文本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有出场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朝代,以及事件的发生发展及至结局的主要过程,而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1]澧县皮影戏抄本虽以提纲本居多,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提纲本之外,澧县皮影戏还有唱词、对白、影人的动作、表情以及部分演出操作动作提示都非常完整的剧本,如向家班向绪庆传抄的皮影剧本《猪八戒背媳妇》中人物角色、念白、唱词、曲调、动作、场景等一应俱全,整个剧本的对白口语化特征非常明显,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鲜明。通过考察不难发现,澧县皮影戏剧本形态较为复杂,这一点也充分表明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从澧县皮影戏的剧目内容来看,多以历史演义、神话传说为主,来源主要依据通俗小说或对地方戏的改编与移植。就皮影剧本的来源方式,学者汤际亨曾归纳为三种:“(一)凭空撰制者;(二)源于小说者;(三)脱胎戏曲者”,且认为“大抵影本皆有所本源与依傍”。^[2]澧县皮影戏的代

表性剧目有:《文王访贤》、《夹龙山》、《瓦岗寨》、《薛仁贵征东》、《杨家将》、《滚丁床》、《五马回朝》、《大破天门阵》、《火焰山》等传统曲目,也出现过《夺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抓壮丁》《打铜锣》《两个党员》等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剧目。向家班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文王访贤》、《杨家将》、《大破天门阵》、《周应龙反五吴》、《四马投唐》、《御果园救驾》、《三收何元庆》、《收姜维》、《三红头》、《三困锁阳》、《徐庶过江》、《秦怀玉杀四门》、《战豹收豹》、《五台会兄》、《网金盆》、《鞭打紫金门》、《火烧余鸿》、《男斩子》、《五雷阵》、《沙陀搬兵》、《黄丝洞》等,这些剧目都取自历史演义与神话传说。据笔者在澧县的田野调查来看,作为接受主体的澧县群众尤其是散居乡镇的民众,因长期受皮影戏、大鼓词等民间曲艺耳濡目染的影响,对历史演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形成了浓厚的兴趣。“人类学的整体观(holism)认为,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各个文化现象之间都存在必然的有机联系,考察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需要注意它由以生成的文化背景。”^[3]据《澧县文化志》记载,宋代末期澧县就有皮影戏班从事演唱活动,绵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艺人的代际传承中,其演出剧目一直以历史剧、神话剧居多。民众虽文化水平不高,但由于受民间曲艺长期的艺术浸染,对历史尤其是涉及帝王将相的南征北战、英雄传奇,王宫后院的公案、轶事、秘史等耳熟能详。依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皮影戏作为当今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族文化内部而言,个体由此而获得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认同,社会生活也因此得以重新整合。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对神话传说的热衷,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民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而形成的一种心理补偿。因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民众对政治、历史、社会的观点往往受到无形或有形的遮蔽,无法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只能寄情于曲艺,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舒缓与宣泄内心的郁积。

从演出习俗来看,澧县皮影戏多用牛皮或硬纸片雕刻成人物、动物和静景影型。人型高约三十公分,无色,侧面,单腿,独臂,肩膀和手上各配一根操作杆。物型(如桌、椅、金殿等)稍具透视感。演唱时,在矮台上置银幕一方,由一人“提影”,将影型贴近银幕,提动操作杆,通过灯光,使影型在银幕上表演各种动作。其他人分司各种乐器、分唱各个角色。皮影戏的演唱用澧县地方方言,音乐、唱腔为荆河戏路子,多为民间祭祀、庆典、祈福、还愿等活动进行演唱。澧县皮影戏的演出多出于民间庙会、传统节日(如阴历七月半的“鬼节”)、祭祀活动、人生礼仪或酬神还愿的需要,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皮影戏的这一宗教功能,与其在长期发展中与道教、佛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以后,由于皮影戏的宗教功能被当作是封建迷信而取缔,皮影戏的发展曾一度低迷。直至1980年代,澧县皮影戏因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而再度兴盛,由政府登记造册的皮影戏班就有十几个,常年在澧县和安乡、临澧、石门、常德、汉寿等地农村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皮影戏的宗教功能逐渐

弱化,娱乐功能跃居其上。皮影戏作为广大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民众的娱乐、精神信仰、习俗生活等息息相关。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澧县皮影戏不时受到现代传媒的猛烈冲击,加之年轻一代对传统曲艺兴趣的淡漠,皮影艺人已是生存维艰,大部分皮影艺人只在农闲时节或春节前后有人请戏时才会重拾皮影戏担。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很少再有年轻人愿意向皮影艺人拜师学艺,皮影戏的传承更是岌岌可危。一旦澧县皮影戏也像其他濒危的艺术门类一样,后人只能透过博物馆里陈列的橱窗来捕捉历史遗迹、探寻民情风俗变迁的话,与其到那个时候再对已成为历史的皮影戏进行抢救性研究,还不如趁着现在到乡野民间多多搜寻、保留、记录皮影戏这一珍贵的民间艺术。皮影戏既是“大众愿望和审美的直接表现”,更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4]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披露:“在那些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化的实际进程的证据中,有一广泛的事实阶梯。我认为可用‘遗留’(Survival)这个术语来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研究遗留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称为迷信的大部分正是属于遗留之中的。除此之外,无论遗留本身大部分是怎样无关紧要,对遗留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清楚地了解遗留的本质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5]从这一角度来讲,澧县皮影戏也有着重要的民俗学价值与人类学价值。探究澧县皮影戏的演出习俗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价值,对我们了解皮影戏这一与历史、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活化石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文化内涵来看,澧县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戏剧艺术,首先,皮影戏的民俗文化功能不可小觑。皮影戏与艺术、民俗间有着密切关系,具有巫术功能、心理调适功能、娱乐审美功能、教育教化功能等多种民俗功能与价值,体现了民众的诸多心理需求^[6]。作为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皮影戏艺术形态的发展与变迁与其生存土壤和民俗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澧县皮影戏作为澧县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征着民众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宗教信仰等原始思维,承担着为民众酬神还愿、调适心理、宣传教化等功能,在民众中仍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次,作为一种活态的艺术形式,澧县皮影戏无论是从静态化的剧本形态、剧目内容、影人造型、雕刻工艺来看,还是从动态化的影戏唱腔、影戏演出、影戏传承等来看,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作为一种融合了信仰、风俗、道德等内涵的综合艺术,澧县皮影戏对于研究澧县民众的态度观念、行为模式以及存在于器物、艺术及行为背后的信仰、抽象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文化符码,其文化意义与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再次,澧县皮影

戏作为中国影戏大家族中的一员,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影戏如河北唐山皮影戏、河北冀南皮影戏、山西孝义皮影戏、辽宁复州皮影戏、浙江海宁皮影戏、陕西华县皮影戏、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广东陆丰皮影戏、湖北江汉平原皮影戏等无论是在影戏唱腔、皮影造型、皮影雕制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它代表着皮影戏家族中无法取代的“这一个”。按照文化人类学“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研究方法,对澧县皮影戏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有利于我们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的比较中探寻澧县皮影戏的独特价值,同时也不难发现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文化冲击与变迁的加剧,给澧县皮影戏带来的巨大生存危机。澧县皮影戏不仅代表着一种曾经繁荣兴盛的民俗活动,更意味着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它忠实记录着我们祖先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澧县皮影戏的表演对象、表演氛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瓦解殆尽,精神土壤更消逝难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少皮影艺人纷纷转向其他艺术门类如澧州大鼓等。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保护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矛盾。对澧县皮影戏展开细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为其绘制详细的发展谱系,摸索出一套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能够为皮影戏在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富有实践意义的贡献。同时,对澧县皮影戏的抢救性研究,有利于为我国其他地域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富有实践价值的启示。

澧县皮影戏作为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既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巫楚文化,又与具有地方特色的荆河戏相结合,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澧县皮影戏渐渐淡出当地人的生活舞台,由以往生活中的应用文化渐渐转化为历史文化,悄悄转为一种历史的纪念、标志、符号、记忆,乃至经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文化认同是确立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其重点是身份认同,意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是文化比喻性的表现(synecdoche representation),因而在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中成为一种想象他人、自我或被他人想象的媒介;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它是对创作者、拥有者及其文化的表达,也是身份诉求、族群认同或隔离的文化资源^[8]。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其进行抢救性研究,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同时,对澧县皮影戏进行抢救性研究,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在全球文明走向同质化的时代坚持本民族的身份标签与情感认同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李跃忠.试析湖南影戏“桥本戏”的文本形态[J].武陵学刊,2013(4).
- [2] 汤际亨.中国地方剧研究之一:滦州影戏[J].中法大学月刊,1936(3).
- [3] 朱凌飞,胡仕海.文化认同与主体间性——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普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J].学术探索,2009(3).
- [4] 郑劭荣.中国影戏特征及其姊妹艺术[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 [5]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6] 李跃忠.影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 [7]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朱正余)